

中共党史文章的写法

周良书

(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,北京 100871)

[摘要]党史文章一般由导言、正文和结论构成,各部分写法也各有不同。具体来说,导言应当精致,有悬念。写法主要有两个:一是“冒头法”,二是“破题法”。正文应当丰满,有内容。这里要把握三个环节:一是“均衡布局”,二是“有序排列”,三是“合理熔裁”。结论应当果敢,有力量。对此,党史研究者可用“首尾呼应”“画龙点睛”“提纲挈领”“补述题蕴”“发人深省”等各种方法。这是就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等一般党史文章写作而言的。除此之外,还有会议文章、纪念文章和党史札记三类体裁在党史研究中也比较常见。它们与一般党史文章,虽有相同之处,但在题材性质和表达方式上却大不一样。这也是写党史文章时需要关注的问题。

[关键词]写法;党史研究;中国共产党

DOI:10.3969/j.issn.1002-1698.2022.09.009

一篇文章或著作,一般由导言、正文和结论构成,各个部分又有各自的分工。导言一般是引入话题,并简要提示本文的创新点。正文可以再细分成若干板块,从几个方面论证文章的观点。结论是对论据和论点的总结,最好在理论或意义上有个提升,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。古人有句形象的话,叫“凤头、猪肚、豹尾”,很有道理。“凤头”是说导言要精致,有悬念;“猪肚”是说正文要丰满,有内容;“豹尾”是说结论要果敢,有力量。“书有体裁,文有法度。”在党史研究中,我们也应当遵守这样的“法度”。

一、难在开局

“文章起头难”,这确是作者的甘苦之言。

因为读者要看他能否提出有趣话题,有无新颖的观点,或者大胆的设问,以形成一个悬念,吸引人家看下去。如果开头抓不住人,读者就看不下去了。这里的关键是,怎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开头方式。其实,一篇文章千变万化,但目的无非是要提出一种主张。现在略去那些细节不说,单就主张的提出来看,最基本的也只有两种方式:一是“冒头法”,二是“破题法”。

“冒头法”,就是讲求“曲径通幽”,其特点是曲、远、缓。作者一般不马上接触本题,而是先来一个发端。比如,《诗经》中有一篇《关雎》,它的开头是: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“冒头法”,叫“由兴起题”,即先说雎鸟相向合鸣,然后兴起君子与淑女

相恋合欢的主题。除此之外,还有义中取题、因事引题、借题发挥等其他具体方法。下面举两篇党史文章加以说明。

比如,毛泽东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一文的开头是:“谁是我们的敌人?谁是我们的朋友?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然后说明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,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,以攻击真正的敌人。最后归结到本题上来:“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,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,作一个大概的分析。”^[1]再如,他另一篇文章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的开头是:“抗战以来,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,大家以为有了出路,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。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,反共声浪,忽又甚嚣尘上,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。”然后提出“中国何处去”,强调“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”,“也是有益的”。最后归结到本题上来:“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”。^[2]

“破题法”,就是讲求“开门见山”,其特点是直、近、急。作者通常不用什么发端,马上就触到本题。比如,韩愈《师说》一文的开头是: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,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”^[3]这篇文章起笔只有两句话,却把师道说得如此郑重,成为全文的纲领,它批评士大夫不尊师道的做法,读来使人既感理至,又觉新异。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“破题法”,叫“开宗明义”。除此之外,还有落笔入题、直述题意、反破题旨等其他具体方法。下面也举两篇党史文章加以说明。

比如,毛泽东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开篇破题,说明“战争的规律”“革命战争的规律”“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”,这是任何指导“战争”“革命战争”“中国革命战争”的人,“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”;然后点题:“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,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,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。”^[4]再如,他另一篇文章《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?》,直接发问:“人的正确思想是

从哪里来的?”然后再问再答: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?不是。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?不是。”这样拨开云雾,达到一笔成局的效果:“人的正确思想,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,只能从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。”^[5]

当然,无论是“冒头法”,还是“破题法”,都要简洁明快、富于变化。一篇文章的开头若出现以下情况,就很不好了。第一,滥用模式,落入俗套。这类文章或平淡无味,或矫揉造作,会让人产生不快之感。第二,扣题不紧,上下不通。有的文章入题虽快,但由于思路不清,文字安排不当,也会给人游离之感。第三,落笔太远,入题太慢。常常是交代过多,好几段文字还未触及正题,这又给人绕远之感。所以,文章开头既不能太平,也不要太长,否则就不是“凤头”了。

然而这也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其实,从内容上看,“文章起头难”,还有更深一层原因。这好比画家面对一幅白纸,总要费许多踌躇,去思考应在哪里下第一笔。但一个成熟的画家就不会这样,他在一笔未下之前,就已思考停当,心中早有了全幅的布置。布置既定,在哪里下第一笔本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作文也是如此。作者在一字未写之前,整篇文章就应该活在胸中了。这时候,用什么方法开头,自然不必下额外的功夫。但若不能胸有成竹,开头确是一件难事。并且,岂止是开头,下面一段段一句句都将无处不难,那简直是盲人骑瞎马,夜半临深池了。

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文章起头难”,是难在对所要论说的对象缺乏彻底的认识,尚未洞悉它的内部和外部的种种矛盾,无法找到解决矛盾的关键,以及解决矛盾的入手之处。这如同医生做手术,不了解人体的复杂结构,不了解病症的具体状况,他就无法正确地下第一刀。所以要解决这个难题,首先就要对研究对象作全面、深刻的了解,并从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中理出一个头绪来,找出它的关键,因为只有解决这个问题,才知道话应当从何谈起。

当然,这也是与作者的历史意识和主观判断

紧密相关的。比如,《三国演义》讲的是魏蜀吴三国争斗的历史,但作者却先从桓灵失政谈起,这固然有历史的根据,但更重要的还在于,作者“推其致乱之由,殆始于桓、灵二帝”。^[6]《水浒传》这一部大书,作者也是先从高俅写起的,因为不写高俅,便写一百单八将,说明乱自下生;而不写一百单八将,先写高俅,则说明乱自上作。所以金圣叹说:“乱自下生,不可训也,作者之所必避也;乱自上作,不可长也,作者之所深惧也。”^[7]这表明一部书的起点放在哪里,是与作者的历史观以及对这段历史的整体认识密不可分的。党史研究也不例外。我们写党史,若单从1921年写起就不能说明问题,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,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作准备的。所以毛泽东说:“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,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。不然,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。”^[8]

此外,文章的开头最好还应有明确的问题意识。这个也要费些功夫去琢磨。比如《岳阳楼记》,作者先说:“岳阳楼之大观”,“前人之述备矣”;后问:“然则北通巫峡,南极潇湘,迁客骚人,多会于此,览物之情,得无异乎?”这里的玄妙就在于,先是一个“备”字,后是一个“异”字。“前人之述备矣”,恰如论文的“学术综述”,而“览物之情,得无异乎”,又如论文的“提出问题”。这种方法我们写党史文章也可以效法。也就是说,前人的成就,可以作为借鉴,它使我们的研究成为可能,而前人的不足,则是将要解决的问题,它使我们的研究成为必要。这应是“凤头”上最精美的地方,若少了这一点,论文的创新就无从谈起了。

二、重在布局

正文是文章的主体,它要有丰富的内容,所以叫“猪肚”。对此,我们必须用浓重的笔墨来写,材料和论证也一定要充分。在这方面,最为重要的是谋篇布局,要善于将丰富的内容层次化,并用章节来加以区分。在安排章节和层次

时,还应注意它的逻辑性,要由浅入深,一环套一环地展开论述,使各个章节之间构成有机的联系,共同形成一个整体。这的确是要大费周章的。因此,最好事先拟一个提纲,然后依次书写。这个提纲即使不写在纸上,也得先写在心头,那叫作“腹稿”。并且,提纲越详细,表明想得越清楚,写成全篇也就越容易,只要把扼要的一句化为充畅的几句,在需要接榫的地方适当地接上榫头就是了,所以还是谋篇布局重要。这其中也有不少需要注意的问题。

第一,均衡布局。一篇论文在布局上是否均衡,不畸轻畸重,这最能体现作者驾驭文章的能力。首先,它表现在各章的篇幅上。衡量的标准主要看两条:其一,每一章所起作用是否明确,是否都为全局所需要。其二,各章所占篇幅与其在全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是否相称。这就要求作者均衡文字,使各部分话题大体平衡。一般说来,拿到一个题目,作者需先想好它涉及哪些问题,并将它们一一列举出来,然后再合并同类项,分成若干部分。但是一篇文章的话题,不会从头到尾都那么精彩。比较精彩、有深刻见解的就那么几点。因此还需进一步思考,如何合理配置它们,使各个部分都能引人注目。所以作者要学会“乾坤大挪移”,将话题从富余的部分,移入薄弱的部分。除此之外,同一个话题也可以采用明说、暗说、顺说、倒说等各种表达方法。其目的就是要在总体上保持平衡,使各部分新意迭起,以增强文章整体的表达效果。

其次,它还体现在史论的关系上。这就要求作者坚持史论结合,在观点和材料上保持总体平衡。一方面,理论或观点是文章的灵魂,是材料的统帅。没有它们,文章就像一个没有主见的人,你既不知道他要赞成什么,也不知道他要反对什么。并且,再进一步说,一切材料是用来说明问题的,并不是用得愈多文章就愈好。如果一味地显摆自己的“收藏品”,反而会让历史患上“浮肿病”。所以我们写文章,还是要注意讲理论讲观点,“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,

陷到一件一事件里面去以后,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,说了许多历史,反而看不到历史”。^[9]然而另一方面,材料又是文章的血肉,是形成理论或观点的依据。没有材料,文章就会流于空论,仿佛一个虚而不实、羸弱干瘪的人,缺少生气,没有力量。事实上,在党史研究中,也确有一些文章,观点是有的,但却举不出材料来证明观点,不能对观点作深入细致的阐述。这类文章,虽有观点却没有史实论证,虽有结论却不能让人信服。因此,一篇好的党史论文,就应当是历史和逻辑的合体,做到史与论的统一。

第二,有序排列。文章除了均衡布局以外,作者还要考虑到一条,如何才能做到全篇浑然一体。就像过去盖房子,用预制板拼接,在两块板之间的联结处,只用铁钩子钩在一起,相互间并没有内在联系,这样的房子实际上还是几大块,一遇地震就全塌掉了。写文章也是如此,不能搞成那样的“板块结构”。检验的标准也主要是两条:其一,各章是否循序渐进,逻辑关系是否严密紧凑,全篇是否有一条中心线索贯穿其中。其二,各章内每一节、每一段是否丝丝入扣、相互配合,形成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只有符合这两条,文章才让人感觉是“流出来的”,而不是“挤出来的”。

这是就内容而言的,其实文章在形式上也要讲究这个。一篇文章好不好,中看不中看,全在于排列的好坏。例如“天地玄黄”四个字,王羲之是这样写,小孩子亦是这样写,但是王羲之写得好,小孩子却写得差,就是因为排列的关系。这种地方要特别注意,不然虽有好材料好观点,也不会受人关注。至于排列的方法,一部分靠训练,一部分靠学习。一些议论文章,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中,有许多案例都是可以效法的。比如,脂砚斋评说《红楼梦》:“事则实事,然亦叙得有间架,有曲折,有顺逆,有映带,有隐有见,有正有闰,以至草蛇灰线、空谷传声、一击两鸣、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、云龙雾雨、两山对峙、烘云托月、背面傅粉、千皴万染,诸奇书中之秘法,亦复不

少。”^[10]这里面的方法就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有序排列的关键是“冷热相间”“张弛并济”。清毛宗岗对《三国演义》曾这样评价:“前卷方叙龙争虎斗,此卷忽写燕语莺声。温柔旖旎,真如饶吹之后,忽听玉箫,疾雷之余,忽见好月,令读者应接不暇”。^[11]我们党史研究者也要学会运用它。对此,胡乔木的意见很重要,他说:写党的历史,“行文要有悬念,有照应,有精辟的议论,动人的描写,有大开大阖的章法。要改变过去那种枯燥、干瘪的写法,使人读起来津津有味,爱不释手”。^[12]

第三,合理熔裁。这是文章谋篇布局上的又一道工序。所谓“熔裁”,就是锻造文章的本体内容,剪裁文章的语言文字。这好比木匠用墨线来度量,用斧头来砍削,使木料整齐端正一样。只有经过这道工序,文章纲领才能明白晓畅,语言文字才不致繁芜杂乱。这里需要把握两个环节:

一是在内容上,应撮其机要。事实上,任何一个笼子都不可能装下所有材料,任何一篇论文也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,所以作者只该把与中心有关的内容写进去,而且要配列周全,使文章的主题显露出来。这是其一。其二,作者还要考虑到自身条件,能否将所有内容连缀成一个有机整体。比如,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本是每章讨论一位主要人物。除了皇帝(万历)、两位内閣大学士(申时行和张居正)、一名地方官员(海瑞)、一名将军(戚继光),以及一位哲学家(李贽)以外,作者还打算再加进一个人物——王世懋。这是一位饱学之士,出版过各式各样的书。他的观点可以给一个时代增加质感和色彩,这有助于读者从特殊角度了解中国的思想史。但由于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,且无法与书中其他人搭上关系,在考虑可读性及一致性之后,作者也只好舍他不用。^[13]

二是在文字上,应裁剪枝叶。大凡文章以说话少、含意多为最妙。文章的厚薄,当由此区分。一般说来,意思少、文章长为薄;篇无剩句、句无剩字为厚。因此,那些漫无限制的随意话,像藤

蔓一样伸出去的枝节话,都要砍削去掉,不让他浪费我们的笔墨。须知文章之美,不在多言,只要表明意思就得。所以刘知几说:“盖鳃虽短,续之则悲;史文虽约,增之反累。”^[14]除此之外,文章段落也要裁剪。这当然是由具体内容来确定的,但长短也应适中,这样才能给人美观的印象。段落太短,显得凌乱;太长了,又显得沉闷。如果再进一步琢磨的话,句子的长短也是大有讲究的。一般说来,有力的话,句子要短一些,抒情话,句子要长一些。这都是作文时应当注意的事项。

三、义在结局

人们常说:“头难起,尾难落。”又说:“编筐编篓,重在收口。描龙画凤,难在点睛。”“口”之所以难“收”,“尾”之所以难“落”,就是因为它是一篇文章走向成功的最后一步。这好比相声中的“收底”。相声的结构,一般分为“垫话”(引子)、“正话”(正题)、“收底”(结尾)。表演就是一个“系包袱”(抛包袱)和“抖包袱”(解包袱)的过程。“包袱”是由夸大或误会所组成的矛盾的合集。“系包袱”就是抛出一个难题;“抖包袱”就是解答这个难题,而笑料往往藏在包袱里面,包袱一响,人家哈哈大笑,这段相声就成功了。

写文章也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部分叫“豹尾”,就是要很有力量的意思。它要求作者在充分展开论述,把问题讲清楚以后,找个合适的地方,将全文有力地刹住,最好让意思再上升一个台阶,使人读后可以举一反三,感到回味无穷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说:“若首唱荣华,而媵句憔悴,则遗势郁湮,余风不畅。此《周易》所谓‘臀无肤,其行次且’也。”^[15]大意是说,文章开头漂亮,但结尾憔悴,那它的文势就会抑郁滞塞,留下的风味也就不畅了。这就是《周易》所说“臀上无肌肉,行路难长远”的道理。所以,对此我们也要多多留意。下面谈一点“结尾”的方法,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。

第一,首尾呼应。这种结尾方式,让人的感

受很特别,仿佛是远涉山水,然后又回到原点,坐定下来,重新品味往常经历一般。极端的例子是开头和结尾用同样的话。如林嗣环的《口技》,开头说:“口技人坐屏障中,一桌、一椅、一扇、一抚尺而已。”结尾说:“忽然抚尺一下,众响毕绝。撤屏视之,一人、一桌、一椅、一扇、一抚尺而已。”前后一样,但经过“百千儿哭”“百千犬吠”以后,回头再看冷清布景、简单道具,的确使人叹为观止、感慨万千。在党史文章中,这种方式也很常见。比如,毛泽东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的开头是:“美国的白皮书,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、快到华盛顿、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——八月五日发表,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。”结尾是:“司徒雷登走了,白皮书来了,很好,很好。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。”^[16]这种表达方式,好比兵书上说的“常山蛇阵”,可以收到“击首则尾应,击尾则首应,击腹则首尾俱应”的效果。

第二,画龙点睛。即先完成文章的主体,最后在结尾处才点明中心,深化主题。这个“点睛之笔”,可使全篇生活灵动,光彩夺目。比如贾谊《过秦论》的结尾: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,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,何也?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”这实际上是全篇的论点,但作者开头没有提出来,中间也没有说,而是放在文章的最后一句。全篇叙述秦国从弱到强、由盛而衰的过程,最后才向读者提出问题,说明它的灭亡是因为“仁义不施”,不懂得攻守异势的道理。在党史文章中,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,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的《实践论》。这篇文章先说明实践的特点和认识的起源,然后再剖析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,最后才点题:“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,这种形式,循环往复以至无穷,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,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。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,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。”^[17]这个“点睛之笔”,就像是一支雕翎箭,把全篇文章的内容,有力地射向读者。

第三,提纲挈领。这个结尾方式主要有两

种:一是“总结陈词”。作者先提出问题,然后层层深入,如剥笋衣,待水到渠成,才将论点和盘托出。例如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,先提出“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”,然后经过一番深入分析和论证,最后才总结陈词: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,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,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,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。”^[18]二是“再现思路”。作者在提出、分析和解决问题以后,再回头解说其论证逻辑和文章主旨。例如毛泽东《论十大关系》的结尾,先说:“一共讲了十点。这十种关系,都是矛盾。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。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。我们的任务,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。”这就是交代论证的逻辑。后说:“道路总是曲折的,前途总是光明的。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、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,直接的、间接的积极因素,全部调动起来,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。”^[19]这就是说明全文的主旨。

第四,补述题蕴。这个结尾方式主要有三种:一是“转入新意”。例如毛泽东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,在论证全部议题后,突然话锋一转:“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。”然后强调:“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。”最后重申:“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,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,稳步地走到目的地。”^[20]二是“继往开来”。例如胡乔木《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〉题记》,在对全书作总体评价以后,开始展望:“进入下个世纪,如果本书作为素材还多少有用,至少书名将改变为《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》之类了。但是,话何必说得这么远呢?”^[21]用这种方式把文章收住,确实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。三是“查缺补漏”。如前所述,任何一篇论文,都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,所以作者要借此机会,对文中遗漏和缺憾作一点补充说明。用这种方式收尾,可使论证的逻辑更为周延,文章的主旨更为坚固。这也是党史论文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结尾方式。

第五,发人深省。这种结尾方式的特点是引人思考,余味无穷。也就是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所说“克终底绩,寄深写远”的意思。例如鲁迅《故乡》的结尾,把希望比作地上的路,然后写出一段发人深省的话:“希望是本无所谓有,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;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^[22]再如毛泽东《纪念白求恩》的结尾,由白求恩想到共产党人的精神,然后也写出一段发人深省的话:“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。从这点出发,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,但只要有点精神,就是一个高尚的人,一个纯粹的人,一个有道德的人,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^[23]这两个结尾都意味深长,饱含哲理,在人生观上予人极大启迪。当然,这个结尾也可指向党史研究中的学理问题,抒发一些本题之外的思考和议论。若能再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,那就最好不过了。

古人说:“为人重晚节,行文看结穴。”这是很有道理的。一篇文章在结穴处若出现以下情况,就前功尽弃了。一是虎头蛇尾,草草收兵。作者在不该结尾处收笔,书不尽言,给人有始无终的印象。二是画蛇添足,尾大不掉。在主题思想充分表达以后,作者节外生枝,当断不断。三是标语口号,生搬硬套。在结尾处,作者凑成个“前进式”或“奋斗式”,喊上两句政治口号,以为这样才能突出主题,加强说服力。其实,文章有无力量,全在于说理,空喊口号,反而显得生硬。这些都是我们党史研究者要引以为戒的。

四、别样体裁

以上方法可用于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等一般党史文章写作,这也是党史研究者接触最多的两种文体。除此之外,还有会议文章、纪念文章和党史札记,这三类体裁在党史研究中也是比较常见的。它们固然都要遵守文章的一般作法,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下面简要说明这三类文章写作中,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。

第一,会议文章。现在学术会议很多,研究者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,去展示自己的知识和才华。但是也有一些会议,学术含量并不高。甚至有的会议,竟成为熟人间的闲话唠嗑,老友间的寒暄问候。每次会议见到的还是那些人,所听到的还是那些话。这样的会就不要去赶趟凑热闹了。

参加会议就要提交论文,这叫“以文入会”。所以会议文章也需认真对待,要争取拿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来,使人耳目一新,让与会者刮目相看。不过,“以文入会”,也是需要“入境问俗”的,不能破坏会议的规矩。古人说:“春秋观志,讽诵旧章,酬酢以为宾荣,吐纳而成身文。”^[24]也就是说,提交一篇好的论文,既可使宾主感到体面和光荣,又能展现自身的文化修养。所以,提交的文章,一定要与会议主题有关,不能“节外生枝”;一定要是成熟的稿子,不能“滥竽充数”。若有会议发言,还需事先认真准备,否则临时磨枪、仓促上阵就不好了。

第二,纪念文章。这主要包括两种文章:一是“学者纪念”文章,即学术界为纪念某一学者而撰写的文章;二是“党史纪念”文章,即学术界为纪念某一党史人物或党史事件而撰写的文章。在党史研究中,我们只要稍作留意,就会看到这样的文章,而一般党史研究者,为人为事,也难免要动笔写这样的文章。

先说“学者纪念”文章。这往往是某一学者的同仁、同事、同学、朋友或学生,为纪念其学术成就和工作业绩而撰写的。研究者以这种方式,对有成就的学者或师长表示敬意,是值得称道的。但写这种文章也要慎重,不可掉以轻心。一方面,其选题一定要在被纪念者所关注的范围之内。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:别人一夸我,我就局促不安,因为他们夸得还不到位。所以,夸人也要夸到他的受用处。另一方面,其评价一定要恰如其分。应该说,表示景仰之情可以理解,但也不可言过其实太远。否则,“褒过而谬体,弄文而失质”,就很不好了。当然,最为重要的,还是要通过“述往事,思来者”,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

望。比如,在《痛悼恩师张静如先生》一文中,笔者写道:“古人云:盖棺论定。余谓先生在定与不定之间。若师门无贤不肖,难继先生之学,则盖棺事定矣。若斯文有传,遗风永续,君子有所恃而无恐,小人有所畏而不为,则先生千古,其功业万世长存可也!”^[25]这就是张先生逝世那一刻,笔者的真实情感、真实愿望。

再说“党史纪念”文章。其实,以周年纪念的方式来研究人物和事件,也是历史学的一个传统。通过定期的交流和讨论,不仅可以反思过去的研究,而且可以规划未来的研究。因此,纪念史学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。但是,它也会使得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廊列其中,造成虚假的学术繁荣。一般说来,在一个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随着研究的深入,这种局面就要打破。也就是说,在党史研究中,我们将来必须摆脱纪念史学窠臼,开展经常性的研究。

当然,对于党史初学者来说,选择一个这方面的课题来做,也未尝不可。因为这样的题目很容易找到,而且写出来也容易发表。但是做这样的事,也要适可而止。除非沿着某一问题深入下去,并且打算把它作为将来读书治学的中心议题,这个另当别论。否则,长此以往,我们的学术研究就只能是打游击,而研究者也只好做没有根据地的散兵游勇了。

第三,党史札记。写札记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,许多史家都用这种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学术成果。在党史学界,龚育之就曾留下大量读史札记。比如《党史札记》一书,就是由他发表的100余篇札记汇集而成的。后来他又继续笔耕不辍,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,现已大多收入《党史札记二集》和《党史札记未编》中。^[26]这些札记长短不一,长有数千言,短则几百字;所涉内容也是大小不一,大者关涉史事、制度,小则只及一词、一字。在龚育之对党史研究的贡献中,这三部《党史札记》,应当是和他的《龚育之论中共党史》,可以交相辉映的。

关于札记与一般论文的关系,顾颉刚讲得就

很透彻。他说：“论文篇幅长，易生芜累，盖立一系统，有不得不加铺张者，既未处处作深研，自必不能无可击之瑕”；“笔记者，或长或短，悉如其分，不多衍一字，有简洁之美。其为文可以自抒心得，亦可以记录人言，其态度可以严肃，亦可以诙谐，随意挥洒，有如行云流水，一任天机，此学术界之小品文也”；“为笔记既多，以之汇入论文，则论文充实矣，作文既多，以之灌于著作，则著作不朽矣”。^[27]所以，党史研究者从札记入手，以为将来的长篇大论作铺垫，也不失为读书治学的一个好门径。

事实上，一般党史研究者，特别是研究生，在阅读中偶得片段知识，但又不足以连缀成一篇长篇文章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最适宜把它整理成学术札记。而这种札记，又大多是考证性的，所以不必加以特别修饰，只需用最短的文字，写出自己要说明的问题就可以了。这类文章，因其短小精悍，且可读性强，也会受到一些报刊的欢迎。比如，《历史研究》《中共党史研究》《读书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华读书报》等，都有这样的栏目。所以党史研究者，只要留意其中，就不愁没有好的选题，不愁没有好的作品。

总之，在党史研究中，只要有新知、有新意，就可落笔成文。至于新知、新意何来？就不好一概而论了。章学诚说：“文字之佳胜，正贵读者之自得；如饮食甘旨，衣服轻暖，衣且食者之领受，各自知之，而难以告人。如欲告人衣食之道，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，可得旨甘；指狐貉而令其自被，可得轻暖，则有是道矣。”^[28]所以我想，新知、新意的由来，也就在这种“自尝”“自被”中吧。除此之外，还真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法子。

注释：

[1][4][17]《毛泽东选集》第1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1

年，第3、170-171、296-297页。

[2][18][23]《毛泽东选集》第2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662-663、709、660页。

[3][唐]韩愈：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，马其昶校注，马茂元整理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47页。

[5]《毛泽东文集》第8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320页。

[6][11][明]罗贯中：《三国演义》，毛宗岗评改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4、92页。

[7]《金圣叹批评本·水浒传》上册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12年，第12页。

[8]《毛泽东文集》第2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404页。

[9][12]《胡乔木传》编写组编：《胡乔木谈中共党史》（修订本）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61、245页。

[10]《脂砚斋全评石头记》，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4页。

[13][美]黄仁宇：《黄河青山：黄仁宇回忆录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433页。

[14][唐]刘知几：《史通通释》，浦起龙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，第161页。

[15][24][南朝梁]刘勰：《文心雕龙》，王运熙等译注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05、23页。

[16][20]《毛泽东选集》第4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1491、1497、1480-1481页。

[19]《毛泽东文集》第7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44页。

[21]胡绳：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，北京：中共党史出版社，1991年，“题记”第3页。

[22]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510页。

[25]周良书：《痛悼恩师张静如先生》，《北京师范大学校报》2016年9月7日。

[26]这两本书均根据第一本《党史札记》的体例，分为两辑：“党史札记”和“往事琐忆及其他”。其中《二集》收录38篇党史札记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；《末编》36篇党史札记，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。

[27]顾洪主编：《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》，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33页。

[28][清]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，叶瑛校注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287页。

[责任编辑：陶婷婷]